

由曾懿 (1852-1927) 的個案看晚清 「疾病的隱喻」與才女身分*

楊 彬 彬**

摘 要

本文旨在借用「疾病的隱喻」這一概念，通過對曾懿——晚清女詩人、醫學家、維新思想者和女性教育的倡導者——這一個案的研究，特別是通過對其多重身分和身分轉換複雜性的詳細剖析，考察晚清中國疾病隱喻的變化如何導致女性與疾病等概念重新形成，並進而導致女性的才女身分發生改變。

關鍵詞：曾懿、疾病的隱喻、女性與疾病、才女身分

「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這一概念由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首先提出，現已成為性別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其核心在於強調疾病作為一種醫學概念所同時具有的豐富文化含義。其

* 特此感謝兩位審查人對本文提出的啟發性意見和修改建議。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作用在於揭示出「性別」和「身體」等相關概念的形成不僅是醫學、文學、文化與政治等種種不同話語 (discourse) 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且也清楚地反映出大環境的變化。本文中有關晚清中國女性與疾病的探討即主要基於這一認識。我認為：民族危亡的意識和現代國家觀念的初步形成是導致晚清中國「疾病的隱喻」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又直接導致了女性和疾病等概念的重新形成，並使得女性的身體再次成為文化關注的焦點。在這種背景之下，女性對自身文化形象的回應和重塑，可能表現為與明清兩代鼎盛的才女文化以及與自身的才女身分發生的決裂——儘管這種決裂又具有其表面性和複雜性。

一、曾懿其人

曾懿 (1852-1927)，字伯淵，又名朗秋，華陽 (今四川成都) 人，是晚清女詩人、醫學家、維新思想者和女性教育的倡導者，著有《古歡室詩詞集》四卷、《醫學篇》八卷、《女學篇》一卷附《中饋錄》一卷。¹ 曾懿家學淵源，其母為晚清著名閨秀詩人左錫嘉，有《冷吟仙館詩稿》八卷、《冷吟仙館詩餘》一卷及《文存》一卷傳世。其父曾詠曾任江西吉安府知府，著有《冷吟仙館詩稿》一卷。曾懿母家陽湖左氏一門才女輩出，姨母左錫璇亦有盛名。姨母之子袁學昌日後即為曾懿夫婿，與曾懿唱和不斷，時稱「管趙」。²

據曾懿次兄曾光煦為《古歡室詩集》所作序，曾懿天資聰穎，其父鍾愛備至，並「罄所藏書藉俾朝夕游泳其中」。³ 曾懿十歲時，父親病逝于江西任上，隨即隨母舉家遷回四川成都，居於浣花草堂。這應當是

1 後均收入《古歡室集》，於光緒 33 年 (1907 年) 出版。

其中，《醫學篇》亦有四卷本行世。本文所引《醫學篇》段落出自《古歡室集》1907 年刻本，分為首卷四卷和二卷四卷。

2 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林政儀教授對曾懿的家族關係有詳細的梳理。參閱林政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0 (2007.03)，頁 179-222。

3 曾光旭，〈《古歡室詩詞集》序〉，頁 1a。

她承母教、受母親影響至深的一段時期。因為隨侍筆墨，她得以涉獵詩詞、書畫、金石諸學。不僅如此，她還「課諸妹以針黹，授幼弟以詩書」。⁴ 閨閣之內還結為吟社，在母親的指導下，兄弟姊妹之間聯句、唱和習作甚多。多年後所做長詩「憶昔篇」裡，她也不勝懷念這段「絳帳鎔經史，紗廚授簡編」、「句覓池塘夢，文題巴蜀牋」以及「涼榭開吟社」的時期。⁵ 由此，曾懿及笄之年便因詩、書、畫造詣之精而被時人譽為「三絕」。她還將丹青與女紅結合，所繡山水花卉精妙絕倫，因而「名滿蜀都」。⁶ 如果我們將精湛的繡藝視為晚清大家閨秀確立自身閨秀身分和表達女性意識的一種手段——而非僅僅是傳統婦德的一種表現⁷——可以說曾懿將這種手段發揮到了極致。更重要的是，她所嫻習的針黹、烹飪諸務也可能表達切合特定時代需求的新意義，這在本文後面將會論及。

事實上，及笄之年是曾懿一生中具有非常意義的一年。自這年始，她「櫻疾五稔」，其間身經四次「溫症」，由於被庸醫誤用傷寒古方療治而數度瀕危。曾府所藏醫書甚為齊備，久病不愈的經歷促使曾懿「博覽《內經》、《素問》，講求醫學之理與衛生之法」，即使病危之際也設法「伏枕自查」，為自己處方療治，終於痊癒。⁸ 這段經歷曾懿後來在《女學篇》自序、《醫學篇》自序以及《醫學篇》中的「溫病、傷寒、傷風辨論」一文中多次提及。這成為她潛心醫學、詳辯醫理的主要動機之一，同時也使疾病成為她詩作中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也即是說，長達五年的臥病和「伏枕自查」的生活使得曾懿這位傳統的閨秀詩人將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導向了醫學領域，從而同時具有了才女與醫家的雙重身

4 曾光旭，〈《古歡室詩詞集》序〉，頁 1a。

5 曾懿，〈憶昔篇八十韻〉，《古歡室詩集》，頁 3.11b。

6 曾光旭，〈《古歡室詩詞集》序〉，頁 1a。

7 Grace S. Fong,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June 2004), p. 47.

8 曾懿，〈《女學篇》自序〉，頁 4a；〈《醫學篇》自序〉，頁 2b；〈溫病、傷寒、傷風辨論〉，《醫學篇》，頁 2.2.3b。

分，並且無論是在詩歌還是在醫學的語境裡都對疾病這一主題具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和詮釋權。

曾懿通過自查而痊癒的經歷還具有某種象徵意義。與明清兩代的才女文化密切相關的是「因才／情薄命」或「因才／情早夭」的「理想」才女形象，如最為人熟知的馮小青和林黛玉，還有近年來為國內外學者所注意的吳江閨秀葉小鸞。這種才女的宿命實際上反映出時人對女性才華既嚮往、推崇又懷有疑慮的複雜心態，同時也是男性文人的審美情趣、忠君思想或對自身境遇的感歎等種種方面的情感投射。⁹ 曾懿在少女時代由詩、書、畫稱「三絕」到「撙疾五稔」的經歷似乎正是因才薄命的典型例證。然而，她自查而癒的結果不僅戲劇性地扭轉了時人想像中才女的宿命，而且顯示出嬌弱多病的才女強勢的一面，似乎象徵著她後來對自身才女身分的改寫以及對女性與疾病的重新定義。

病癒後的曾懿開始了被人稱為「管趙」的理想婚姻。她育有六子，自己也由承母教轉而施母教，其中三子後來皆中進士任官或授官。到她55歲這一年（1907），《古歡室集》正式出版，是她詩、詞、醫學和女學方面作品的總集。她已成為受人尊敬的「曾太夫人」，詩作被譽為「觀正始之音」而具有了道德權威。¹⁰ 對於曾懿沒有因才而早夭、詩作也不離溫柔敦厚之旨，有序作者這樣評論：「太恭人之福德非常，而文辭之風雅又足以睥睨一世。古之所謂窮然後工、與夫所謂不平則鳴者，太恭人殆矯其流弊者歟。」¹¹ 還有序作者認為她「古今才媛不可多得之遇以

9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簡要舉例如下：Anne Gerritsen, "The Many Guises of Xiaoluan: The Legacy of a Girl Poe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7:2 (Summer 2005), pp. 38-61. Wilt Idema, "Male Fantasies and Female Realities: Chu Shu-chen and Chang Yu-niang and Their Biographers," in Harriet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E. J. Brill, 1999), pp. 19-52. 王人恩, 〈「雙木起而二馬廢」：試論林黛玉形象對馮小青的繼承和超越〉,《明清小說研究》,期4(2003),頁119-130. Ellen Widmer, "Xiao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June 1992), pp. 111-155.

10 嚴謙潤, 〈《古歡室詩詞集》序〉,頁10a。

11 嚴謙潤, 〈《古歡室詩詞集》序〉,頁11a。

一身兼之，則又獨異也。」¹² 曼素恩 (Susan Mann) 在總結《國朝閩秀正始集》的編者、清代重要閩秀詩人惲珠的一生時指出，如果一位有著「詠絮之才」的年輕閩秀詩人沒有因才而早夭，那麼她很可能會成長為一位嚴厲的閩塾師，擔負起道德訓誡的任務——而這兩者同為「盛清才女的典範」。¹³ 身處晚清的曾懿同樣是這樣的才女典範，並且在她治癒自身疾病之後，上述兩種才女模式在她身上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然而，與盛清相比，晚清畢竟是清帝國統治急轉直下、政治形勢急劇動盪的一個時期。西方列強的入侵使民族存亡的問題迅速成為知識階層關注的焦點，也導致晚清社會、文化、思想等大環境發生劇烈的變化。如果說對於惲珠這位盛清才女的典範來說，詩歌是盛世教化的工具，那麼對於曾懿這位晚清才女的典範來說，「盛世」幻象的破滅不僅使詩歌變成「無裨時艱」的文字之戲，還促使她尋求更為實際的救國道路。具體來說，就是由自查而癒走向以醫藥救人，並進而救國。要從更深層面上瞭解曾懿的這種轉變，以及這種轉變與其才女身分的變化之間的關係，必須首先考察「疾病的隱喻」在晚清的變化。

二、「疾病的隱喻」與晚清中國

所謂「疾病的隱喻」，首先強調的是疾病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醫學概念。桑塔格對肺結核的分析，重點就在於揭示肺結核在 18、19 世紀英國的社會、文化和文學種種語境中具有豐富涵義，主要分為如下幾個層次：第一，情與病，即將感情、欲求或情欲與肺結核緊密相聯的傾向。一方面，肺結核病人由發燒引起的面部潮紅被視為象徵著內心燃燒的神秘火焰，即一種如火焰般具有吞噬力量的激情與欲望。肺結核也由之成為一種「激情的病」(a disease of passion)，一種既由激情引發，又象徵與呈現著激情的病。另一方面，由於激情常常與不受自我約束、隨心所欲

12 繆荃孫，〈《古歡室詩詞集》序〉，頁 6a。

13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8.

相聯繫，肺結核也有了自我毀滅、墮落、邪惡以及偏離社會常態等意味。在這種認識下，任何不受約束或反叛社會的欲望都可能被貶斥為病態。第二，與此緊密相關的是病態美的問題。肺結核所暗含的「激情」的聯想賦予肺結核病人一種特殊的吸引力與誘惑力。同時，與此似乎形成悖論的是，肺結核的病態美也被視為一種空靈的、純潔的、精神的而非肉體的美。在浪漫主義運動中，它象徵著精神的高貴、對藝術的敏感以及口味的獨特與高雅。因此消瘦、蒼白的病態美也成為年輕藝術家和詩人們自己所追逐的時尚。第三，正因為肺結核呈現出的病態美成為一種時尚，疾病本身也成了「身體的內在裝飾」和一種「對自我的新態度的象徵」。¹⁴ 這樣，疾病不但是特立獨行的個性的象徵，而且成為「一種強烈展現內心世界的語言，即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桑塔格強調，疾病本身就「訴說著表達的欲望」。¹⁵

在此基礎上，後來的學者更側重於揭示疾病的性別特性 (gender specificity)，尤其是女性以及女性身體的概念生成如何為滲透於醫學中的文化涵義所左右。例如，在 19 世紀英國文學和醫學著作中都會受到廣泛關注的「因愛而瘋狂的女人」(the lovmad woman)，這一形象就集中了幾乎所有有關女性「情與病」的文化想像。簡要概括起來，這一形象首先反映了視女性所謂的過度情感／情緒化 (excessive emotionality) 為病態的一種普遍傾向。女性的情感既被用於解釋她們各種身體或精神疾病的病因，又被視為這種種疾病的具體表現症狀。其次，這一形象集中反映出醫生們對女性一切情感或欲求的警惕，以及他們試圖通過「監控」女性情感和解讀情感經由身體發出的信號而預知疾病、控制症狀和尋求治療方法的努力。同時，這一形象也反映出醫生和大眾都深信不疑的所謂情感／情緒的傳染性。例如，人們相信女性是易感讀者群，而閱讀小說（尤其是浪漫故事）所激發的情感能直接轉化為她們身體上的症狀或疾病。醫生們經常對此發出嚴厲告誡，相信避免閱讀是避免女性青春期疾病的有效手段。最後，這一形象也反映出文藝作品對以上種種醫學和

14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8), p. 27.

15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p. 43.

文化想像的融合、利用和再詮釋。例如，由浪漫主義詩人和先拉斐爾派畫家共同掀起的新「奧菲利婭熱」使所謂「愛情瘋症」的影響更為廣泛，也使女性消瘦的病態美更為時尚；而不少女性作家則借用類似的角色來表達女性被壓抑的欲求或試圖借疾病（尤其是所謂「歇斯底里」疾病）與社會達成一定程度妥協的願望。¹⁶

在意識到 19 世紀英國與晚清中國在各方面均存在巨大差異的前提下，可以借用「疾病的隱喻」這一有用視角考察晚清中國女性與疾病的概念生成與變化。但要考察晚清則不能不提及晚清以前，尤其是晚明以至盛清，因為這一時期「理想」才女形象的構建在相當程度上正基於對女性與疾病的文化想像。前面提及的因才／情薄命或早夭的才女形象就是其時文化、思想、文學以及醫學等不同話語交互作用的結果。簡言之，這一形象至少包含了明清時期「疾病的隱喻」在以下幾個層面的含義：第一，與薄命或早夭相聯的病弱美首先反映了一種文人審美情趣。與 19 世紀的英國相似，這種病弱之美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男性文人對女性病弱身體的推崇中，我們同時看到的是他們對女性才、情的想像，乃至他們對自身境遇的聯想和對自身「個性」、審美品味以及文人身分的強調。總體而言，疾病與明清文化想像中的理想才女形象發生聯繫，乃是其時盛行的「情」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¹⁷ 第二，如前所

16 維多利亞研究中有關女性與疾病的著述極為豐富，簡要舉例如下：Pamela K. Gilbert, *Disease, Desire, and the Body in Victorian Women's Popular Nov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lizabeth K. Helsinger and others, *The Woman Question: Social Issues, 1837-1883*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3). Cynthia E. Russett, *Sexual Science: The Victorian Construction of Womanhoo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Elaine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Hellen Small, *Love's Madness: Medicine, the Novel, and Female Insanity, 1800-1865*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6). Athena Vrettos, *Somatic Fictions: Imagining Illness in Victorian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Jane Wood, *Passion and Pathology in Victorian Fic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Maram Epstein在the "Gendering of Desire"一章中曾論及明清「情」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理想化及其與疾病的關係。參閱Maram Epstein, *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述，因才薄命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種複雜文化心態的產物。可以說，它既是當時有關女性才華的激烈爭論的反映，又是對興盛於此時的女性詩歌創作活動、以及「德、才、色兼備」的女性詩人形象的一種回應。第三，病弱才女形象也是醫學概念與文學想像結合的產物。例如，情／欲與疾病的對應關係，尤其是將女性各種疾病歸因於情感鬱結或欲求受阻，也常見於傳統中醫的理論中。¹⁸ 當這種理論融入文學想像，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中秦可卿因為「心性高強、聰明不過」而導致「憂慮傷脾、肝木忒旺。」¹⁹ 而林黛玉這位典型的病弱才女在走筆題帕時病由情生：「林黛玉……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萌。」²⁰

如果說 19 世紀英國「疾病的隱喻」在很大程度上植根於並反映著浪漫主義潮流，那麼中國明清時期「疾病的隱喻」在很大程度上植根於並反映著當時的文人文化和才女文化。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疾病的隱喻」卻常常都指向某種雅文學和雅文化，與「個性」、「品味」和「高雅」相聯。然而，在晚清中國，政治環境的劇變使得「疾病的隱喻」中政治含義具有了壓倒一切的地位。由「東亞病夫」的屈辱稱號所激發的治癒國家和民族「痼疾」的激進思想不僅導致「疾病的隱喻」發生根本性改變，而且進一步將這種「痼疾」歸咎於此前的雅文學和雅文化，乃至歸咎於整個文學和文化傳統。既然病弱的才女形象在明清「疾病的隱喻」中居於核心地位，那麼在晚清疾病隱喻劇變之中這一形像就首當其衝。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87-109. 「情」文化自身也受到思想、文化等大環境變化的影響，從晚明至清並不是一成不變的；Epstein 在本章中也有論述。此外，參閱 Martin Huang, "Sentiments of Desire: Thoughts on the Cult of Qing in Ming-Qing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0 (Dec., 1998), pp. 153-184.

18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9 曹雪芹，《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0 回，頁 153。

20 曹雪芹，《紅樓夢》，34 回，頁 470。

當前許多學者在反思晚清以至「五·四」時期激進知識分子與傳統決裂的傾向時都注意到，這種決裂首先是基於對傳統的重新構建之上。因為要將受辱於列強歸咎於整個中國文化傳統，所以這一傳統必然是一無是處：黑暗、蒙昧、落後、痼疾纏身，與現代國家形成強烈對比。這樣，明清「疾病的隱喻」所指向的文人文化和才女文化也被構建為一種病態的、過於陰柔和缺乏活力的文化傳統，徹底喪失了原來的審美內涵。胡纓在分析梁啟超的〈記江西康女士〉一文時就指出，梁將整個才女傳統概括為「披風弄月」、「拈花弄草」和「傷春惜別」；對他而言，才女傳統就代表著一種過於「女性化」的文化傳統，導致了「國家男性化力量的喪失」。而正是梁對才女傳統的摒棄宣告了中國第一位「新女性」——康愛德，中國第一位在西方完成教育的女醫生——的出現。²¹

梁啟超對才女傳統的構建是基於明清男性文人對理想才女的想像之上的。為了切合他所面臨的時代主題，梁對這一已經男性構建的才女傳統進行再次構建，在摒棄其審美內涵的同時也將其確認為事實上的才女傳統。近年來，明清女性詩歌的研究者已多次指出閨秀詩人們真實的創作活動與男性想像之間的距離。那麼，我們不僅要將病弱才女的形象與真實的閨秀詩人分開，而且在考察晚清疾病隱喻的劇變導致才女傳統被摒棄時，也應當考察此時才女本人對此做出的反應，或者她們在這一系列的劇變中起了何種作用。曾懿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個案研究的機會。

三、由「不寐」到「治不寐靈效方」

以下引用的一首詩和一則藥方分別出自《古歡室詩集》和《醫學篇》，也許可以揭示曾懿的身分轉換及其複雜性：

21 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9(2001)，頁10-11。

秋夜不寐寄外子省親閩中 其一

心怯眠難穩，釵橫髻墮鴉。
 鼠頻驚枕榻，蟲又語窗紗。
 自恨工詩苦，偏叫吟興賒。
 黃花尚未放，人已瘦如花。²²

治驚悸不寐靈效方

真珠母，六錢；龍齒，二錢；酒芍，一錢五分；夜合花，二錢；丹參，二錢；歸身，二錢；蓮子，二十粒，打碎不去心；夜交藤，三錢，切；柏子霜，二錢；紅棗，十枚。²³

很明顯，儘管主題都是「不寐」，但是詩歌和醫學的話語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為閩秀詩人的曾懿沒有將「不寐」作為一種病態，而是像很多以此為題材的詩作一樣，將此作為自遣、抒懷的一個契機。同時，她將「不寐」與傳統的「寄遠」主題結合，一方面描寫自己的孤單（如「心怯眠難穩」），另一方面描寫自己的病弱之美（如「釵橫髻墮鴉」，以及由李清照「人比黃花瘦」一句化出的「黃花尚未放，人已瘦如花」）。值得注意的是，她還表現出許多明清女詩人共有的一個傾向，即將「病起」、「不寐」一類的題目與詩歌寫作聯繫在一起。這種傾向與女詩人們急於樹立自己的才女身分有關，因為定義「才女」的就是她在詩歌方面的才華和創作激情。²⁴ 這裡，「自恨工詩苦，偏叫吟興賒」一聯表現的就是曾懿難以遏制的創作激情和她的才女形象。但是，當曾懿以醫者身分替換她的才女身分時，「不寐」就確定無疑地成了一種病態。曾懿用醫學語言將其準確定義為「驚悸不寐」，即確定其病因為「驚悸」，並以十種藥材製成「靈效方」加以療治。

才女身分與醫者身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引人深思。一方面，由「不寐」到「治不寐靈效方」似乎代表著一個轉變的過程。儘管我們難以確

22 曾懿，《古歡室詩集》，頁 3.15a-3.15b。

23 曾懿，《醫學篇》，頁 2.1.14b-2.1.15a。

24 有關明清女性詩歌中疾病與詩歌寫作的聯繫需要另有專文論述。

切地斷定它們的寫作有時間上的先後順序，²⁵ 但曾懿在《女學篇》自序中明確指出她的寫作目的因時局發生了前後轉換，似乎暗示著一種身分的轉換，或者至少是身分側重上的變化：

懿幼承母訓，夙好金石詞章之學與圖畫、針黹、烹飪之術。及笄，櫻疾五稔。博覽《內經》、《素問》，講求醫學之理與衛生之法。迨于歸也，涉大江，越重洋，遨遊東南各行省。值海禁洞開，中原多故。默察中國數十年政權變遷之大勢，與夫列強數十國鯨吞蠶食之陰謀，則又怒焉憂之。汲汲焉，皇皇焉，以靳所謂自強之計。……

懿不才、不敏。所幸母氏、姑氏皆秉才德，博通經史，節孝炳然。母氏所作《冷吟館全集》已久傳於世。今將君姑所作《碧梧紅蕉館詩集》、懿所作《古歡室詩詞集》四卷均付之棗梨。因思詞章之學，無裨時艱。今隨宦皖北，端居多暇，乃取昔稟承母與姑之教為懿所身體力行者，作《女學篇》，外而愛國，內而齊家。精之及教育衛生之理，淺之在女紅中饋之方。……²⁶

張百熙在為《女學篇》作序時，也特別將其寫作目的解釋為曾懿因為「時艱」而「摒棄詩詞書畫，以為無益於世」，轉而作《女學篇》和《醫學篇》。²⁷ 那麼，是時局的危難促使曾懿尋求詞章之學之外的更為實際的救國道路。除了興女學，還要從拯救病體入手——就是前面提及的由療己走向療人從而救國的重要轉變，也即是《醫學篇》所囊括的上百個「靈效方」，包括上述的「治驚悸不寐靈效方」。²⁸ 進一步說，「不寐」一詩中的病弱之美和確立才女身分的意識代表著養育曾懿的才女傳

25 若按各序言寫作時間來看，《古歡室詩詞集》最早的序言寫於光緒 16 年 (1890)；《女學篇》最早的序言寫於光緒 31 年 (1905)；而《醫學篇》唯一的一篇序言即曾懿自序寫於光緒 32 年 (1906)。但具體到篇章上，則無法確定「不寐」一詩一定寫於「治不寐靈效方」之前。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中的一位為我指出這一點。

26 曾懿，〈《女學篇》自序〉，頁 4a-5b。

27 張百熙，〈《女學篇》序〉，頁 2b-3a。

28 關於曾懿拯救病體以救國的思想，這裡僅作初步介紹，本文後面還有繼續論述。

統，但是晚清疾病隱喻的劇變又導致整個才女傳統和它所代表的過於「女性化」的文化傳統被摒棄。所以，曾懿「摒棄詩詞書畫」的舉動似乎也象徵著她與滋養她的才女傳統以及與自身的才女身分發生的決裂。緊接著的就是由「治不寐靈效方」所代表的醫者身分和維新者身分的強化。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這一身分轉換的過程具有其複雜性，即其並不像表面上那樣決絕、明瞭。在上面的引文中，曾懿在宣稱「詞章之學，無裨時艱」的同時還告知讀者「今將君姑所作《碧梧紅蕉館詩集》、懿所作《古歡室詩詞集》四卷均付之棗梨」，並且在自謙之時還明顯對自己家族中的才女傳統表露出自豪之感。如果出版詩詞集等於確認自己詩人和才女的身分，而與此同時出版自己家族中上一代才女的詩詞集等於確認這種身分所根植的才女傳統，那麼這些舉動同上述她與自身才女身分的決裂幾乎發生在同時。尤為重要的是，代表著曾懿維新者身分強化的《女學篇》(關於《女學篇》中的維新思想本文後面還有詳細論述)正來源於她家族中的才女傳統，因為她乃是「取昔稟承母與姑之教為懿所身體力行者」而寫成此篇。這樣，在上述身分轉換的表像之下，則是才女身分和醫者身分及維新者身分的悖論式並存。

四、由「多愁多病身」到「禁錮」說：女性病因的再定義

由救治人的身體進而救治國家的痼疾，這是晚清以至五四時期許多知識分子的一貫思路。在這一點上，曾懿這一個案並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她的重要性一方面就在於她身分轉換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在於她以醫者身分對晚清疾病隱喻的介入。而這些都集中地反映在她對女性的病體這一問題的表述上。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身為才女的曾懿如何對待這一問題。下面是她一首名為〈菩薩蠻春日病中寄叔俊四妹壽春〉(其七)的詞下半闕：

留春頻繾綣，淚滴琉璃盞。

生小太多情，多愁多病身。²⁹

這幾句詞充分反映出曾懿對描寫女性病弱之美的詩歌傳統的熟諳。她對自己「生小太多情」的天生敏感氣質與「多愁多病身」的病弱之軀顯然有自負之意，並且在兩者間確立了一種因果關係，即，是天生的「多情」氣質導致了她的「多愁」傾向，因而才有了她的「多病身」。那麼，在這裡，女性的病體就是敏感氣質的結果和具體表現，不僅帶來美感，而且指向一種精神的高貴。

在同一題目下的另一闕詞中，曾懿所呈現出的自身形象與林黛玉這位病弱才女的典型合而為一：

晝長無意緒，綠寫蕉箋句。

莫頌葬花詩，玉籠鸚鵡知。³⁰

在這闕以「病中」為題的詞中，「病」字甚至沒有出現過一次。但「病」的意象就在「無意緒」的情緒中，也在這種情緒之下寫在蕉葉上的詞句中，更在「葬花詩」的典故中。因此，這些詞句進一步為曾懿強化了她的「多愁多病身」。

上述詞句正好印證了梁啟超心目中工愁善病的才女形象。「情」、「愁」、「病」等字眼也是許多晚清知識分子激烈抨擊的對象。在對晚清女報《女子世界》的研究中，夏曉虹就摘取了號召女子「共扶情根，共扶病體」的言論。在這樣的言論中，「情」與「病」不僅變成了「情魔」與「病魔」，還共同造就了「女魔」。³¹ 有的激烈言辭出於女子自己之口，例如夏所引女校學生劉瑞平的〈敬告二萬萬同胞姊妹〉一文就抨擊女子：「又復婀娜娉婷，工愁善病，相率為玉樹臨風、傷離歎別之

29 曾懿，《古歡室詞集》，頁 2a。在最後一句中，曾懿借用了《紅樓夢》中寶玉對黛玉自比張生時的一句話：「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曹雪芹，《紅樓夢》，23 回，頁 325。

30 曾懿，〈菩薩蠻春日病中寄叔俊四妹壽春〉其九，《古歡室詞集》，頁 2b。所引部分為這首詞的下半闕。

31 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期 2 (1904)。轉引自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80-81。

醜態」。³² 所以，曾懿在《醫學篇》中對女性病體的詮釋有了斬截的轉變。例如，她有一則專門針對女性的藥方名為：「治婦女臟燥悲傷好哭，自己不解其故，如有鬼神附者」。³³ 這就是說，如果一個女子像曾懿自己曾經那樣「留春頻繾綣，淚滴琉璃盞」，她也許並不是有天生多情多愁的敏感氣質。相反地，她的抑鬱是身體病變的症狀，即由「臟燥」引發的「悲傷好哭」。而這種抑鬱也許並不那麼具有美感，表現為自己都不解其故，甚至像有鬼神附體。

但要注意的是，在詩歌話語和醫學話語的巨大差異之下，其實還是有某種共通之處的，那就是情與病的對應。前面已經提到，曾懿的「多病身」是由情感因素——「多情」和「多愁」——導致的。而在上面的藥方中，這種情與病的關係被倒置，即情感變化成為身體病變的外在症狀。其實，不論這兩者誰為因誰為果，它們之間的對應在曾懿的詠病詩作和醫學論述中隨處可見。例如，在《醫學篇》自序中，曾懿就用到了傳統中醫中常見的「七情六氣之感」致病的理論。³⁴ 情與病的問題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曾懿重新定義女性與疾病的一切努力均始於此。

讓我們先看一看在沒有性別特指的情況下，曾懿是如何闡述情與病的原理的：

傷寒溫病原由

此症雖屬外感，然多患於勞心之人。並處以深幽之屋，空氣不得流通，最易患此。乃緣勞心操作，血氣每多壅滯。凡風寒暑濕，凝結不散，收入臟腑，積久複感風寒暑濕，因之激起而作。……

人之身中，肺為華蓋，上有兩管。一為食管，上承飲食；一為氣管，以通呼吸。所以受病皆由呼吸引進。故病始來，皆在肺經，徑用輕散肺邪，得汗即愈，不致傳至各經矣。故西醫治病之法雖不及中國，而杜病之法實有甚於中醫者。凡人

32 轉引自：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97。

33 曾懿，《醫學篇》，頁2.2.1b-2.2.2a。

34 曾懿，〈《醫學篇》自序〉，頁2b。

苟能節勞以保腦力，時吸新鮮空氣以保肺氣，兼能運動使血絡流通，自能百病不生而臻壽域矣。³⁵

首先要看到的是，不論是她對風寒暑濕等致病因素的分析，還是她對輕散肺邪、不致傳經的治療手段的採納，使用的都是傳統的中醫語言。但實際上，她是用中醫的語言吸納和融合西醫的思想，這表現在：第一，儘管勞心以致病再次印證了傳統中醫中情與病的對應關係，但「節勞以保腦力」卻是 19 世紀中後期西醫中流行的觀點，而且特別針對女性。³⁶ 第二，呼吸新鮮空氣和運動都是當時由西醫傳來的觀點，在清末十分盛行，報刊文字中到處可見。第三，利用人體結構的理論來解釋病因也顯示出晚清傳入的西醫解剖學的影響。³⁷ 也許是爲了不激怒數量眾多的西醫欺人論者，曾懿使用了折中的辦法，即表面上承認西醫治病之法不及中醫，實際上強調的是西醫有勝於中醫之處。

以中醫語言吸納西醫思想是曾懿的一貫辦法，在下面一段引文中我們還會看到。最重要的是，空氣流通和運動將與女性的疾病密切相關，而上面的「處以深幽之屋」則成了其中的關鍵：

婦科主方

婦女之病，治法均與男症同，惟多天癸一門而已。昔者，女子幽囚於深閨之中，不能散悶於外。非但中懷鬱結不舒，即空氣亦不流通。多病之由職是故也。主治之法，審其無外感別症，惟有養血疏肝為主。幸近年來漸趨文明，講求運動、衛生，婦科之病當因之而減矣。……³⁸

表面上，女子的「多病身」似乎又與她們的「多情」和「多愁」有了關係，因爲「中懷鬱結不舒」在這裡被列爲女子多病的主因。但曾懿

35 曾懿，《醫學篇》，頁 1.1.4b-1.1.5a。

36 Cynthia E. Russett, *Sexual Science: The Victorian Construction of Womanhood*, pp. 113-119.

37 據何小蓮研究，西醫東漸始於明末，在晚清譯著尤爲豐富。最早傳入的就是解剖學的理論。具體參閱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41-268。

38 曾懿，《醫學篇》，頁 2.2.1a。

真正的目的卻是將女性的疾病歸咎於她們行動被禁錮的生活狀態，即「幽囚於深閨之中，不能散悶於外」，不僅導致情緒抑鬱，而且由於空氣不流通容易生病。這樣，我們前面看到的深閨之中「淚滴琉璃盞」的美人形象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義。實際上，這種「禁錮說」是在表面遵從傳統中醫解釋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女性病因的全新定義，並且明顯帶上了當時已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女權主義的印記。這一點會在後面的討論中得到進一步印證。

在她提出的療法上，也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正如許多中國醫學史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中醫傳統理論中向來有女子之病應當與男子之病區分，並且因為情感因素的參雜而比後者複雜難治的看法。儘管這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理論，但在各個時期的醫學典籍中確能經常看到。³⁹ 而曾懿一開始就打破了這種看法，聲稱女性的疾病「治法均與男症同」，只是與她們生育方面相關的婦科疾病需要分開診治。這樣，她一方面打破了女性疾病與情感因素間的所謂必然聯繫，另一方面又利用這種聯繫，即中懷鬱結以致病，進而提出禁錮以致病，從而顯示出她對傳統理論的策略性選擇。第二，儘管她提出的治療女性疾病的方法似乎也是傳統中醫的療法，即「養血疏肝」，但她實際要宣揚的卻是非常西式的概念：「文明」、「運動」、「衛生」。正是在這些盛行於晚清的新名詞中，她看到了減少或治癒女性疾病的希望。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引文中看似不起眼的「昔者」兩字。這兩個字的出現立刻把女性「幽囚於深閨」的生活確定為一種「過去」或「歷史」，而且是一種極具褒貶色彩的過去。這與梁啟超和許多晚清激進知識分子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如果要使中國成為現代強國，就要與它的過去決裂；而要與過去決裂，首先就要建構出這樣一種「黑

39 Marta E. Hanson, "Depleted Men, Emotional Women: Gender and Medicine in the Ming Dynasty," *Nan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7:2 (Oct. 2005), pp. 287-304. Sabine Wilms, "'Ten Times More Difficult to Treat': Female Bodies in Medical Texts from Early Imperial China," *Nan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7:2 (Oct. 2005), pp. 182-215.

暗過去」，作為「現代」的對比或參照。對曾懿來說，建構女性被禁錮的過去是她界定女性疾病的需要，也是她在此基礎上重新定義女性的需要。

五、纏足與「病」

禁錮以致病之說的邏輯結果就是破除禁錮以治病。在《女學篇》中，這一點變得具體化，聚焦在纏足的問題上。有關纏足一事的爭論，在晚清本就十分激烈。這也與「疾病的隱喻」密切相關，因為為眾多晚清知識分子所詬病的女子病弱之態就往往被歸咎於纏足。在很大程度上，纏足已失去原有的審美含義，變成女性被禁錮、被壓迫和整個中國「黑暗過去」的象徵。高彥頤在她關於纏足史的專著中就指明，纏足在晚清成爲了「一切『傳統』中錯誤的代表」，因而被納入照相機的鏡頭之下展示女性身體上的變形和扭曲。而事實上深閨中纏足的女性也許並不像這些激進知識分子想像的那樣是一些「一事無成、被禁錮的生命」。⁴⁰

曾懿的《論纏足之損益》一文就是這樣的時代精神的產物。文章一開始，她就將纏足與「自由」這一問題聯繫起來。也許又是出於策略的考慮，她首先聲稱：「中國之民，較之歐洲，其自由不啻百倍；中國女子爲國權所不及，其自由尤甚。」然後立刻筆鋒一轉，確定纏足是女性自由的桎梏：「乃梏二萬萬女子之足，使不得步，是奪其自由之權力。……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也。」接著，她詳述自己幼年的痛苦體會，認爲中國變法維新的益處之一就是使女子「脫離此難」，並對各地「天足會」的倡議十之七、八未被採納表示不解。她不僅再三「嘵音瘖口」爲女子痛陳利害，敦促她們放足，並且給了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每次將鞋襪樣放長大一、二分，鞋頭令圓勿尖，則一年可放長一、二寸，兩年則放成矣。」⁴¹

40 Dorothy Ko, *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28.

41 曾懿，《女學篇》，頁 21b。

對曾懿來說，用實際可行的方法放足就等於治癒女子的痼疾：「……其益維何？步履便捷，食物易於運化，且免中國女子普通之肝氣病，保身之益也。」⁴² 從這個意義上說，纏足已經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疾病，它的治癒與否成了拯救女性病體的關鍵。這不僅是因為它本身作為一種肉體上的變形需要治療，而且因為它關係到另一種具體的疾病，即「肝氣病」——這種最能體現情與病對應關係、又常常被認定為女性所特有的疾病。同時，如果「幽囚於深閨」是女子多病之由，那麼放足帶來的行動自由就是根除這種多病的藥方。當然，不論是女性的行動自由還是拯救女性病體都不是最終目的。同許多晚清維新派知識分子一樣，曾懿的一切努力最終都指向「強國保種」的大目標：

精神健固，能任操勞，得盡其應盡之義務，治家之益也。生育兒女，血脈強壯，使種族日益繁盛，強國之益也。有此三益，則我同胞二萬萬人，平日為人視若玩具者，一旦盡變為有用之材。此非特吾同胞之幸福，殆亦我中國前途之大幸福也。⁴³

至此，纏足與「病」已具有了若干個層次上的聯繫。在具體層面上，纏足是肉體的變形和扭曲，也是女性病弱之體的主因。在象徵層面上，纏足代表著過於女性化以至於病態的文化傳統，或者說是「一切『傳統』中錯誤的代表」。進一步說，它代表的從女性的疾病跳躍到了國家的痼疾。所以，治癒纏足這種「病」最終能治癒的也由女性的身體擴充到了整個種族和國家的「身體」。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這個從治癒女性病體向治癒國家「病體」轉換的過程中，曾懿將女性的作用放在了首位。在她重新定義女性疾病的努力中，也包含了她重新定義女性本身的努力。最明顯的就是上面引文中女性由「玩具」到「有用之材」的身分轉換，而這種身分轉換是在女性對家庭、對國家的職責或作用的實現過程中才能完成的。治癒了痼疾，「能任操勞」的女性可以治家；作為身體強健的母親，她們又能使種族

42 曾懿，《女學篇》，頁22a。

43 曾懿，《女學篇》，頁22a。

「血脈強壯」。這就在另一種意義上顯示出女性與疾病的緊密關聯。

其實，由治癒女性病體到治家、強國的思路本身就on不是完全與「傳統」脫離的新鮮說法，而是建立于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基礎之上的。所不同的是，這裡所仰賴的不是儒家的君子，而是一向被視為玩物的女子。在「身」、「家」、「國」的三個層次上，曾懿都體現出她對「身體」的強烈關注：由女性的病弱身體到她們作為主婦的強健身體，再到她們作為母親的強健身體，最後到強健的種族和國民身體。這種對身體的強烈關注不僅落實在《醫學篇》中的病理論述和上百種藥方上，也由《女學篇》作出了具體表述。很明顯，這是時代精神在這位由傳統才女轉變而來的維新思想者身上的具體反映。但下面我們將會看到，這種思路又因曾懿自身的特殊身分而打上了她的個人印記。

六、女學與天下：從施母教到救家國

要使中國女子盡數變為有用之材，必須興女學。談到興女學，不能不首先談到梁啟超著名的〈論女學〉一文，特別是文中最經常被引用的一段：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⁴⁴

在這裡，梁賦予女學的前所未有的重要意義是建立在母教和蒙養基礎之上的。這兩者也並非脫離「傳統」的新鮮事物，而應被視作才女傳統的一部分。本文前面論及的「盛清才女的典範」之一，閨塾師，體現的就是母教傳統。曾懿本人也展現了由承母教到施母教的才女成長過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女學篇》是曾懿才女身分與維新者身分悖論式結合的產物。同時，它又滲透了曾懿在醫者身分下書寫的醫學話語而具有了更為複雜的意義。

44 梁啟超，〈論女學〉，《梁啟超全集》，卷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32。

在詳細討論《女學篇》之前，可以對曾懿由施母教的閨塾師到興女學的維新者的身分轉換過程略作分析。本文前面提到的閨塾師的道德訓誡聲音我們可以在曾懿以「曾太夫人」身分所寫的「病起示兒」長詩中清楚地聽到，節選如下：

病起苦炎烤，鬱紆意不適。
眷念宦遊子，天涯互相隔。
……
願兒志四方，雲程奮六翮。
……
願兒儷璠璣，匡君并輔國。
願兒如陽春，隨時布德澤。
靄靄出岫雲，瞳瞳浴海日。
勉哉為霖雨，努力同修德。⁴⁵

在這裡，母親對宦遊在外諸子的思念之情轉化成了對他們的勉勵和訓誡。在一系列的「願兒……」的要求中，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的匡君輔國和為百姓布霖雨的思想，也能察覺到母教與天下的關聯。在《醫學篇》中，曾懿對天下的關懷體現在根治天下蒼生百病的「靈效方」中，以及詳辨庸醫之誤、「敢為天下人告非」的宣言中。⁴⁶到了《女學篇》自贊，則體現在「坤道湮滅，伊誰匡扶」的振奮之語中。⁴⁷在這個過程中，儘管有身分的轉換，但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曾懿與「傳統」的決裂，更多的卻是「傳統」在她身上的延續和轉化。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傳統的延續性又並不妨礙她提出女學方面的維新思想。

在《女學總論》中，曾懿重新定義「女學」，回答了女子是否應當學、應當學什麼這兩個明清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以此作為重新定義女性的基礎：

……夫國者，家之積也；家者，個人之積也。女子有學，其

45 曾懿，〈夏末秋初炎蒸未退，病起無聊，作此以示諸子〉，《古歡室詩集》，頁 3.24b-3.25a。

46 曾懿，〈溫病、傷寒、傷風辨論〉，《醫學篇》，頁 2.2.4b。

47 曾懿，〈《女學篇》自贊〉，頁 1a。

功僅一家而止？擴而充之，無家不學，直一國之福也。況女子之心，其專靜純一，且勝於男子。果能教之得法，宜可大勝於男子者。……故男子可學者，女子亦無不可學。歷觀古今女子，具有過人之才學、享淑名、膺賢譽者，何可勝數……推之經史、詞章、圖畫、體育諸學，可以益人神智；算學、針黹、工藝、烹飪諸學，可以供人效用。能秉此學以相夫，則家政以理。能秉此學以訓子，則教育以興。《大學》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真篤論哉！⁴⁸

同梁啟超一樣，曾懿首先將「女子有學」的意義擴充到了整個國家。然後，她利用人們固有的性別差異的觀念，將女子性情「專靜純一」作為女子有勝於男子的理由，並進而提出了「男子可學者，女子亦無不可學」的大膽結論。這等於是在要求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權利。在此基礎上，她開列了一長串女學的科目，內容不僅包含傳統婦德範疇內的針黹和烹飪，也包括通常認為男子才能研習的經史、詞章之學，以至於有實際效用的算學，以及晚清大受提倡的體育。為了使女學的範疇盡可能地拓廣，她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詞章之學，無裨時艱」的論斷，甚至也似乎忘記了自己有關「節勞以保腦力」的防病之理。她關注的是由她重新定義的女學所能造就的女性，也即是能理家政、施母教、有用於國的女性。

至少在表面上，這樣的女性其實與曾懿心目中「享淑名、膺賢譽」的古代賢媛才女相差不遠。這也許是出於淡化整個《女學篇》女權色彩的策略性考慮。另一方面，當曾懿用《女學篇》中的頭兩章詳論「結婚」、「夫婦」，特別是涉及「自由結婚」和「平權」等新名詞的時候，她也確實處處告誡人們不要空喊口號而忽略了女子傳統的職責。甚至在號召女子「共起競爭之志」的時候，她也希望女子首先要「守其天賦之責任」。⁴⁹ 可以說，曾懿希望看到的新的女性是應時而變的傳統才女，或者說傳統才女在時代要求下的轉化，而不是與傳統才女徹底決裂的「新女性」。

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女學篇》的章節結構，就會發現曾懿對女性

48 曾懿，〈女學總論〉，《女學篇》，頁 1a-1b。

49 曾懿，〈《女學篇》自序〉，頁 4b。

的重新定義其實另有側重。自第三章始，「胎產」、「哺育」、「繡襪教育」、「幼稚教育」諸章不僅著重強調女子作為母親的身分和職責，而且更重要的是教授女子醫藥、衛生方面的知識，例如：「胎產」一章中「治惡阻」、「妊婦之衛生」、「保小產」、「產後之衛生」、「產後之利害」諸節；「哺育」一章中有關哺乳、嬰兒飲食衛生、種痘的期限和飲食諸節；「繡襪教育」一章中「防傾跌」、「戒恐嚇」諸節；「幼稚教育」一章中有關蒙養、發育時期的培養，以及前面討論過的論纏足等諸節。緊接其後的「養老」一章其實也重在教授有關老人飲食、衣著和居室等方面的衛生知識。而最後一章則直接以「衛生」為題，總論「眠睡」、「飲食」、「居室」、「衣被」各方面的衛生知識。有意思的是，在《女學篇》之後，曾懿還附有《中饋錄》一卷，共二十節，其實是二十則非常實用的食譜，包括製作火腿、香腸、糟魚、皮蛋、豆瓣、醬油、冬菜、甜醪酒、以至月餅等等食物的方法。在《中饋總論》中，她除了強調女子主中饋的傳統職責，還指出她的目的也在於教授女子節用、衛生之法。

這樣，曾懿在女性傳統的母親和主婦的職責中特別突顯出她們作為家庭健康和衛生的守護者這一職責。這一點正與她自己的醫者身分密不可分，也與她拯救病體以強國的思路是一致的。一位曾出使日本、目睹了日本女子教育現狀的《女學篇》序作者就特別指出：「夫人又以教育本原莫大乎尊生，於是上起《靈》、《素》，下迄近代醫家言，靡不研究，成《醫學篇》一 [四] 卷。」⁵⁰ 這就把曾懿寫作《醫學篇》和《女學篇》的目的合而為一。曾懿自己在〈衛生〉一章引言中把女性的衛生和醫學知識的重要性說得很清楚：

女子既嫁為一家之主婦，實一家治安之所繫。故欲強國，必自強種始。欲全國之種強，必自家庭之衛生始。……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云，縱令富貴安逸，苟有一人臥病呻吟懊惱，則一家之歡樂為之解散，和氣洋洋之家庭忽變為暗澹悽悽之

50 吳慶坻，〈《女學篇》序〉，頁2a。

悲境。旨哉斯言！是以為一家之主婦者，於眠睡、飲食、居室、衣被、寒暑、燥濕種種均須留意，宜綢繆於未雨之先。甚至起居、動作、遊玩皆有適宜之法。並須善於自衛，使身體強固，方能操作稱意。否則身軀孱弱，常罹疾病，輾轉床榻，上不能侍奉舅姑，中不足以佐夫持家，下無力以撫教兒女，不獨釀一身之困苦，且家庭之樂事悉化為烏有。**故不獨宜重衛生，且宜兼習醫學。**使一家強則國強，國強則種族亦因之而強矣。⁵¹

在這裡，身、家、國的聯繫再一次得到加強，而嫻習衛生、醫學之理的主婦是其中的關鍵。上面文字加粗之處（筆者所加）尤其值得注意。我們可以將其聯繫到曾懿在《醫學篇》中的自謙之詞，如「懿本女流，性又不敏」，不宜學醫，因為：「非博覽群書、抱用世之才不足以語醫也；亦非天資明敏、工壽世之術不可以學醫也」。⁵² 對照之下，不僅可見曾懿對自己醫者身分的明抑暗揚，更可見她對女子習醫寄予的厚望和對女性才華本身的褒揚。

曾懿對女性的褒揚達到極致是在《女學總論》最後；這裡也是《女學篇》女權色彩最濃厚的地方：

……從此劃去錮習，與男子以學相戰。馴至男女智識相等，強弱自能相等，不求平權而自平權矣。……且從此男女智識互相競爭，各求進步，黃種之強，殆將駕環球而上矣。懿願天下之為母者，教育子女、經理家務務各盡其道。使男子應盡之義務無不與女子共之；男子應享之權利亦無不與女子共之。……則一國受其福，影響之捷，速於置郵。一國之中，驟增有用之才至二萬萬人之多，夫何貧弱之足患哉。⁵³

在這個男女平等、各求進步的理想社會中，女子的職責由主家政、施母教擴展到與男子共同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女學和平權的目的最終也將

51 曾懿，《女學篇》，頁 29a-29b。

52 曾懿，〈《醫學篇》自序〉，頁 2b。

53 曾懿，〈女學總論〉，《女學篇》，頁 3a。

歸結到種族的強盛和國家的崛起。至此，曾懿在重新定義女性疾病、界定女學的基礎之上重新界定了女性的職責或身分，即：治癒病弱之體後生育強健種族並施以母教的母親；主理家政並確保家庭健康的主婦；與男子「以學相戰」，共同享受權利和分擔義務的現代強國的建設者。

七、結 論

曾懿這一個案的重要性在於她一身而兼具數種身分，並且以不同身分積極介入晚清中國「疾病的隱喻」以及女性與疾病等概念的重新界定。首先，她對自身身分的選擇取捨清楚地展現出她由傳統才女向維新思想者過渡的完整過程，因而可被視作「新女性」出現的前奏，呈現出近代女性史中過渡性的一個環節。其次，她以女詩人身分所寫的詠病詩、以醫者身分所寫的《醫學篇》和以維新思想者身分所寫的《女學篇》具體地呈現出不同話語之間在女性與疾病這一問題上相互融合、借鑒和衝突的錯綜關係，也顯示出晚清西醫東漸所導致的傳統中醫在性別、人體、病因等概念上的變化。尤為重要的是，她重新定義女性與疾病的努力正代表著晚清維新派知識分子將一切納入「強國保種」大目標下的傾向和與傳統決裂的決心；但她所體現出的過渡性和融合性又揭示出這種傾向和決心之下傳統持續不斷的影響。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曹雪芹，〈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 曾懿，〈古歡室集〉，光緒 33 年 (1907 年) 刻本。
- Esptein, Maram. *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Furth, Charlotte.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Gilbert, Pamela K. *Disease, Desire, and the Body in Victorian Women's Popular Nov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elsing, Elizabeth K., and others. *The Woman Question: Social Issues, 1837-1883*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3).
- Ko, Dorothy. *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Mann, Susa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ussett, Cynthia E. *Sexual Science: The Victorian Construction of Womanhoo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howalter, Elaine.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 Small, Hellen. *Love's Madness: Medicine, the Novel, and Female Insanity, 1800-1865*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6).
-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8).
- Vrettos, Athena. *Somatic Fictions: Imagining Illness in Victorian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Wood, Jane. *Passion and Pathology in Victorian Fic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二、論文

王人恩，〈「雙木起而二馬廢」：試論林黛玉形象對馮小青的繼承和超越〉，《明清小說研究》，期4(2003)，頁119-130。

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30(2007.03)，頁179-222。

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啓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9(2001)，頁1-29。

梁啓超，〈論女學〉，沈鵬等主編，《梁啓超全集》，卷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30-33。

Fong, Grace S.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June 2004), pp. 1-58.

Gerritsen, Anne. "The Many Guises of Xiaoluan: The Legacy of a Girl Poe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7:2 (Summer 2005), pp. 38-61.

Hanson, Marta E. "Depleted Men, Emotional Women: Gender and Medicine in the Ming Dynasty," *Nan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7:2 (Oct. 2005), pp. 287-304.

Huang, Martin. "Sentiments of Desire: Thoughts on the Cult of *Qing* in Ming-Qing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0 (Dec. 1998), pp. 153-184.

Idema, Wilt. "Male Fantasies and Female Realities: Chu Shu-chen and Chang Yu-niang and Their Biographers," in Harriet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E. J. Brill, 1999, pp. 19-52.

Widmer, Ellen. "Xiao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June 1992), pp. 111-55.

Wilms, Sabine. “‘Ten Times More Difficult to Treat’: Female Bodies in Medical Texts from Early Imperial China,” *Nan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7:2 (Oct. 2005), pp. 182-215.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the “*Cainü*”
Identity During the Late Qing —
Seen through the Case of
Zeng Yi (1852-1927)

Bin-bin Yang

Abstract

In this essay, I borrow the concept of “illness as metaphor” in presenting a case study of Zeng Yi (1852-1927), a late Qing woman poet, physician, reformer, and advocate of women’s education. By examining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she assumed,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ies that arose as she agilely shifted between these identities, I intend to look into the larger question of how changes in thinking about “illness as metaphor” during the late Qing initiated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women and illness and, further, led to changes in the “*cainü*” (talented female) identity.

Key Words: Zeng Yi, “illness as metaphor,” women and illness, “*cainü*” identity